

# 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及 合意投资消费区间

——基于跨国数据的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

蔡跃洲<sup>1</sup>，王玉霞<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2.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分析了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并对我国的合意投资消费区间进行了匡算。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本文对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国际比较，利用跨国面板分析、中国协整分析，佐证国际比较相关判断，并匡算我国合意投资消费区间。结果表明：经济发展阶段及城市化水平、经济外向型程度、地域及文化传统、经济体制等都对投资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综合这些因素，我国当前合意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区间为40%~45%和55%~60%；当前投资消费结构明显失衡，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应兼顾优化投资消费结构。

**[关键词]** 投资率；消费率；合意区间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6X(2010)01-0024-07

##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都处于高投资、低消费状况，2000年后更是呈现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率不断上升趋势。2006年，消费率已经降至50%以下，2008年又进一步下降为48.6%。2008年11月开始，中央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关刺激计划是否加剧投资消费失衡的担忧也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重新讨论我国的合意投资率、消费率区间，对于完善刺激计划、促进结构调整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投资率和消费率具有共生性，但已有研究更多

地关注投资率，对消费率的研究较少。

国外有关投资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魁奈等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也曾系统阐述了积累率问题。<sup>[1]</sup>凯恩斯从总需求总供给均衡的角度指出，合理投资水平应该与消费互补，并以充分就业为标准。<sup>[2]</sup>

由于资本积累被看做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因此很多增长理论也涉及储蓄率及投资率。<sup>[3][4]</sup>

在我国，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投资率（积累率）就备受政府和学界关注。薄一波提出：“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sup>[2]</sup>董辅弼从国民经济对积累基金的最低需求及追加需求、国民收入的

**[收稿日期]** 2009-10-29

**[作者简介]** 蔡跃洲（1975—），男，江西余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王玉霞（1962—），女，辽宁沈阳人，中央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教授。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笔者已作了相应的修改，同时感谢商务部研究院赵萍副研究员的宝贵意见，本文文责自负。

物质构成两方面探讨了合理积累率的确定。<sup>[5]</sup>杨坚白也认为要从积累基金最低限和最高限来确定合理的积累率。<sup>[6][7]</sup>

20世纪90年代后的研究对最优投资率或者说合意投资率标准进行了更为详细具体的界定,合意的标准也由以往的固定比率变为动态比率区间。<sup>[8][9][10][11][12]</sup>

在投资率合理区间方面,各研究间差别也不大。马秀岩主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水平为25%~35%;<sup>[12]</sup>孙炎林认为我国的投资率应该维持在40.8%左右;<sup>[10]</sup>吴忠群则认为投资率的合理区间应为35%~38%。<sup>[11]</sup>李建伟、卢中原等人还对我国和其他国家投资率变动规律进行了对比。卢中原预测2000—2010年间我国的投资率在30%~40%,2020年以后在30%~35%。<sup>[13][14]</sup>

## 二、基于各国经验数据的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体制对投资消费结构都有重要影响。此外,影响因素还包括经济外向程度、地域文化差异等。笔者将从各国经验数据出发进行分析。

### (一) 经济发展与投资消费结构

人均GDP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下收入”、“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四类,代表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从全球发展指数数据库各类经济体及OECD国家1960—2007年的投资消费结构数据来看,投资消费结构演变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是低收入经济体消费率最高、投资率最低,并存在消费率逐步降低、投资率逐步提高趋势。消费率在1970年以前维持在接近90%的水平,1970—1975年逐步降低,之后基本在80%左右;投资率在2002年以前基本在20%以内,近几年保持在23%~24%。

二是中下收入经济体消费率最低、投资率最高。消费率1970—1978年间呈下降趋势,此后虽然有波动,但都维持在70%左右;投资率到1978

年以后基本在30%左右。

三是中上收入经济体呈消费率先降后升、投资率先升后降趋势。消费率由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80%左右,逐步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72%~74%,然后又逐步上升至当前的83%;投资率则由20世纪60年代的20%左右逐步上升到80年代初的25%~26%,此后略有下降并稳定在20%左右。

四是高收入经济体呈消费率稳中有升、投资率稳中有降趋势。消费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72%~74%,小幅攀升至20世纪末的78%;投资率则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25%~27%,小幅下降至目前的20%。OECD国家与整个高收入经济体保持高度一致。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除去基本消费外没有太多剩余,形成了消费率高、投资率低的格局。当经济发展跨越低水平阶段后,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除去基本消费外还有较多剩余,加上强烈的增长冲动,社会资源将被更多地用于积累和投资。当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后,消费需求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发展趋于平稳。此时,消费率会有所提高,而投资率则有所下降,整个投资消费结构趋于稳定。上述变动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动也密切相关。罗斯托、钱纳里等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将不断转换。主导产业转换将带来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变化,引致投资消费结构变化。<sup>[15][16]</sup>在较低发展阶段,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第二产业比重很低,全社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积累率也较低;随着经济发展,第二产业比重逐渐加大,投资率也随之上升;进入较高发展阶段后,分工细化和消费升级带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和投资率下降。

除了产业结构的变动外,经济发展还表现为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对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从消费方面来讲,城市化推进会将城市生活方式普及到更多的人群,引致消费率提高。<sup>[17]</sup>而且,城市化推进还会增加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带动政府消费。从投资方面来讲,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而提高投资率。因此,城市化对消费率的促进可能需要城市

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逐步显现。

(二) 经济外向程度与投资消费结构

投资消费结构与经济的外向程度也有密切关系。外向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应该有较低的消费率和较高投资率。因为，在贸易保持基本平衡条件下，较高外向程度意味着进出口方面“大进大出”。大量出口需要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形成；而大量的进口中，消费品的比重往往也较低。对比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4个发展阶段相似的经济体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体，外向程度较高的澳大利亚，消费率高10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投资率则低5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

(三) 地域文化与投资消费结构

地域文化也是影响投资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西方7国均处于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英美两国的消费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3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相应投资率也低3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欧洲大陆3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非常相近，并趋于消费率80%、投资率20%的水平。日本作为西方7国中唯一的东亚国家，消费率低于其他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率则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类似地，韩国、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同属中上收入经济体，但是，拉美三国消费率基本维持在75%~80%左右，而东亚两国则基本维持在60%~70%之间。已是高收入经济体的中国香港、新加坡，消费率也在60%~70%间波动。上述东亚四个经济体投资率都维持在30%以上；而拉美三国的投资率则在20%左右。东亚经济体普遍有着高投资、低消费的倾向，这是因为东亚各民族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的传统。

(四) 经济体制与投资消费结构

经济体制也是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俄罗

斯、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4国1989—1991年转轨前后的数据表明，转轨前的消费率明显低于转轨后的消费率，而转轨前的投资率则明显高于转轨后的投资率；4国都属于中上收入经济体，转轨前投资率都维持在30%甚至更高水平。转轨后，除保加利亚外，它们的投资率基本稳定在20%~25%。上述变化说明，经济体制对投资消费结构有着重要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率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率大约能高出5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

三、投资消费结构影响的计量检验

下面，笔者采用计量工具做进一步的分析，具体包括：(1) 利用跨国数据，就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外向型程度等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进行面板数据分析；(2) 利用相关数据分析相关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在中国的数据是否成立。

(一) 基于跨国数据的面板数据分析

跨国面板数据分析的基本思路是，选取人均GDP、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外贸依存度作为代理变量，就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外向型程度等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由于前期消费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将上期消费率也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对应的符号分别是：消费率是CONS、人均GDP(美元不变价)是INC、人均GDP(PPP)是INCP、城市化率是URB、外贸依存度是DEP。相应的对数序列在前面加上ln，前期变量在后面加上(-1)。时间跨度定为1991—2005年。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前，先利用截面F检验、豪斯曼检验等确定面板数据的具体模型。(见表1)<sup>[18]</sup>

表1 截距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检验结果表

| 冗余固定效应检验；合成数据对象：CONS；<br>检验截面固定效应。 |           |           |        | 相关随机效应的豪斯曼检验；<br>合成数据对象：CONS |         |         |        |
|------------------------------------|-----------|-----------|--------|------------------------------|---------|---------|--------|
| 效应检验                               | 统计值       | 自由度       | 收尾概率   | 检验结果                         | 卡方统计值   | 卡方检验自由度 | 收尾概率   |
| 截面F检验                              | 4.10328   | (22, 315) | 0.0000 | 截面卡<br>方检验                   | 86.1792 | 22      | 0.0000 |
| 截面随机效应                             | 74.670123 | 4         | 0.0000 |                              |         |         |        |

如果不考虑上期消费率因素，回归结果得到的DW值仅为0.61，具有一阶自相关。

表1显示,拒绝假设1,即回归斜率系数和截距都相同;拒绝假设2,即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最终选择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有关的结果见表2。

表2 各类不同国家消费率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 被解释变量: CONS; 方法: 广义最小二乘; 区间: 1990—2005年 |          |          |          |        | 固定效应(截面) |        |          |        |
|---|----------|----------|----------|--------|----------|--------|----------|--------|
| 观测期: 16; 截面: 23; 总的面板观测数: 364           |          |          |          |        | _US-C    | - 2.11 | _TAIL-C  | 0.974  |
| 解释变量                                    | 系数       | 标准差      | t统计值     | 收尾概率   | _UK-C    | 0.052  | _VIET-C  | 4.530  |
| C                                       | 26.1477  | 5.5502   | 4.7111   | 0.0000 | _CANAC   | - 1.56 | _INDIA-C | 1.811  |
| CONS(-1)                                | 0.6191   | 0.0380   | 16.2958  | 0.0000 | _GERM-C  | - 1.58 | _AUST-C  | - 2.61 |
| INC                                     | 0.0002   | 0.0001   | 1.6868   | 0.0926 | _FRAN-C  | - 0.93 | _ARGE-C  | - 0.26 |
| DEP                                     | - 0.0385 | 0.0096   | - 3.9948 | 0.0001 | _ITALY-C | - 1.03 | _BRAZ-C  | 1.289  |
| URB                                     | 0.0481   | 0.0710   | 0.6777   | 0.4985 | _JAPAN-C | - 6.40 | _MEXI-C  | 1.638  |
| 加权统计量                                   |          |          |          |        | _KOR-C   | - 4.27 | _RUSS-C  | - 1.73 |
| 拟合优度                                    | 0.9406   | 因变量中位数   |          | 75.00  | _HK-C    | 1.148  | _BULG-C  | 7.068  |
|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 0.9357   | 因变量标准离差  |          | 8.822  | _SINGA-C | - 2.95 | _HUNG-C  | 3.223  |
| 回归标准误                                   | 2.2368   | 残差平方和    |          | 1576   | _MALA-C  | - 1.00 | _POL-C   | 3.762  |
| 对数似然值                                   | - 746.54 | F统计值     |          | 191.9  | _INDO-C  | 0.583  | -        | -      |
| DW值                                     | 1.6237   | 概率(F统计值) |          | 0.000  | -        | -      | -        | -      |

从表2的结果来看,表征城市化率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回归结果是不显著的,收尾概率高达0.50左右,有必要将其剔除后再进行检验,有关结果见表3。

表3 不含城市化率为解释变量的消费率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 被解释变量: CONS; 方法: 广义最小二乘; 区间: 1990—2005年 |          |          |          |        | 固定效应(截面) |        |          |        |
|---|----------|----------|----------|--------|----------|--------|----------|--------|
| 观测期: 16; 截面: 23; 总的面板观测数: 364           |          |          |          |        | _US-C    | - 1.79 | _TAIL-C  | - 0.77 |
| 解释变量                                    | 系数       | 标准差      | t统计值     | 收尾概率   | _UK-C    | 0.97   | _VIET-C  | 2.48   |
| C                                       | 29.3076  | 3.0078   | 9.7438   | 0.0000 | _CANAC   | - 1.18 | _INDIA-C | 0.04   |
| CONS(-1)                                | 0.6176   | 0.0379   | 16.2977  | 0.0000 | _GERM-C  | - 1.45 | _AUST-C  | - 1.76 |
| INC                                     | 0.0002   | 0.0001   | 1.8516   | 0.0650 | _FRAN-C  | - 0.66 | _ARGE-C  | 0.88   |
| DEP                                     | - 0.0369 | 0.0093   | - 3.9525 | 0.0001 | _ITALY-C | - 1.12 | _BRAZ-C  | 2.02   |
| 加权统计量                                   |          |          |          |        | _JAPAN-C | - 6.79 | _MEXI-C  | 2.02   |
| 拟合优度                                    | 0.9405   | 因变量中位数   |          | 75.00  | _KOR-C   | - 3.76 | _RUSS-C  | - 1.37 |
|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 0.9358   | 因变量标准离差  |          | 8.822  | _HK-C    | 2.21   | _BULG-C  | 7.17   |
| 回归标准误                                   | 2.2349   | 残差平方和    |          | 1578   | _SINGA-C | - 1.93 | _HUNG-C  | 3.12   |
| 对数似然值                                   | - 746.79 | F统计值     |          | 199.9  | _MALA-C  | - 1.53 | _POL-C   | 3.57   |
| DW值                                     | 1.6195   | 概率(F统计值) |          | 0.000  | _INDO-C  | - 0.66 | —        | —      |

对比表3和表2可以看出,两者的拟合优度、DW值都相差无几;表3中各解释变量的收尾概率

加入被解释变量前期值,模型变为动态面板。从中可以看到,动态面板中最大似然估计和协方差估计不一致,为了解决有偏问题,应取一阶差分构造工具变量。然而,这种处理最终的拟合优度仅为0.01,且各解释变量对应的收尾概率非常大。其原因在于,差分虽能消除自相关保证一致性,但也造成了大量信息损失,差分序列无法真实代表原序列并反映原序列因果关系。基于此,本文放弃对一致性的追求,而是直接使用原序列。

好于表2；前期消费、人均GDP及外贸依存度对于消费率有较显著的影响。为验证上述判断的稳健性，将解释变量中的“人均GDP”换成购买力平价，重新检验得到的回归结果。利用各变量的对数值，重复上述检验过程，检验结果也比较稳健。

面板分析结果表明，上期消费率对当期消费率有很大影响，消费的前期示范效应在宏观层面依然存在；人均GDP对消费率产生正向影响但程度并不大，可能是因为各类经济体的消费率都呈倒U

型变化，总体差距也不大；经济外向型程度对消费率的负相关作用较明显；城市化程度与消费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二) 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

为了验证相关机制在中国是否成立，选取人均GDP、城市人口比重和外贸依存度作为替代变量，对它们与消费率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协整分析。表4检验结果表明，城市人口比重和外贸依存度为一阶单位根过程，人均GDP和消费率为平稳过程，满足协整分析的条件。

表4 中国数据对数序列单位根检验

| 序列名称   | 数据阶数 | 检验方程   | t统计值   | 收尾概率 | 序列名称   | 数据阶数 | 检验方程   | t统计值   | 收尾概率 |
|--------|------|--------|--------|------|--------|------|--------|--------|------|
| lnCONS | 水平   | (T, 4) | - 6.32 | 0.00 | lnINC  | 水平   | (T, 3) | - 4.33 | 0.01 |
| lnDEP  | 水平   | (T, 1) | - 3.00 | 0.15 | lnINCP | 水平   | (T, 3) | - 4.54 | 0.01 |
| —      | 水平   | (C, 1) | - 1.47 | 0.54 | lnURB  | 水平   | (T, 4) | - 0.93 | 0.94 |
| —      | 水平   | (N, 1) | 0.95   | 0.90 | -      | 水平   | (C, 4) | - 2.40 | 0.15 |
| —      | 一阶   | (T, 0) | - 3.24 | 0.10 | -      | 水平   | (N, 4) | - 0.13 | 0.63 |
| —      | 一阶   | (C, 1) | - 3.74 | 0.01 | -      | 一阶   | (T, 0) | - 3.71 | 0.04 |

以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前期消费率、人均GDP、城市人口比重和外贸依存度为解释变量，采用

“一般到特殊”规则，就各相关变量的对数序列进行协整分析，最终选取最为合适的协整模型（见表5）。

表5 无人均GDP项的对数序列协整分析回归结果

| 被解释变量：LNEHC方法：最小二乘；    |        |      |        |      | 统计值      |       |          |        |
|------------------------|--------|------|--------|------|----------|-------|----------|--------|
| 样本区间：1979—2008年；样本数：30 |        |      |        |      | 拟合优度     | 0.94  | 因变量中位数   | 4.08   |
| 解释变量                   | 系数     | 标准差  | t统计值   | 收尾概率 |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 0.93  | 因变量标准离差  | 0.09   |
|                        |        |      |        |      | C        | 1.36  | 0.44     | 3.09   |
| lnCONS (-1)            | 0.71   | 0.09 | 8.17   | 0.00 | 残差平方和    | 0.02  | 施瓦茨标准    | - 4.19 |
| lnDEP                  | - 0.13 | 0.03 | - 4.00 | 0.00 | 对数似然值    | 69.69 | F统计值     | 91.47  |
| lnURB                  | 0.08   | 0.05 | 1.60   | 0.12 | DW值      | 1.56  | 概率(F统计值) | 0.00   |
|                        |        |      |        |      | —        | —     | —        |        |

从表5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高达0.93，DW值也保持在1.5~1.6，包括各变量t统计值都相对显著，说明表5模型能较好反映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据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 消费率与其一期滞后序列、外贸依存度及城市化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上期消费率影响最大，弹性系数高达0.71，说明中国消费的前期示范效应比较明显。(2) 人均GDP对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

能是，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基本属于“中下收入”发展阶段，GDP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而同一发展阶段消费率变动也不会太大。另外，我国长期存在着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保障缺失，人均GDP的提高无法有效促进消费。(3) 外贸依存度对消费率有着较为明显的负相关作用，对消费率的弹性为-0.13，可以佐证国际数据面板分析的相关判断。(4) 城市化率对启动消费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影

限于篇幅，文章略去了变量置换、对数序列以及针对东亚地区、发达国家的具体检验结果，需要者可向笔者索取。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直到2008年人均GDP才突破3000美元，正式由“中下收入国家”转变为“中上收入国家”。

响程度并不大,弹性仅为0.08。这可能是因为我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既存在城市生活方式带来的促进消费因素,又存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投资增加的因素,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对冲作用。

#### 四、几点判断和相关政策建议

##### (一) 关于投资消费结构的几点判断

综合国际比较、跨国数据面板分析和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可以对投资消费结构变化规律和趋势、投资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及我国合理投资消费结构区间作出如下判断:

(1) 投资消费结构的演变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由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演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将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上述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水平变化和城市化推进,带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

(2) 经济外向程度、地域文化传统以及经济体制等因素对投资消费结构也有显著影响。外向程度高的经济体具有较高的投资率和较低的消费率;东亚地区普遍具有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倾向;计划经济体制下期望投资率高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期望投资率。

(3) 上期消费率、外贸依存度和城市化率与消费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其中,上期消费率对当前消费率起着最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人均GDP的影响并不显著,外贸依存度和城市化水平则分别产生负向作用和正向作用。

(4) 我国当前的高投资、低消费结构有较大的合理性。我国目前正处于投资率最高的发展阶段;计划体制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当前外向程度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高储蓄又是中华和整个东亚文化的传统。综合这几项因素,大致匡算我国的合意投

资率区间为40%~45%,相应的消费率为55%~60%。

##### (二) 对当前经济刺激政策的相关建议

以上述匡算的合意投资消费率区间为标准,我国当前投资率明显偏高,而消费率则明显偏低。投资消费严重失衡的趋势若不能得到根本性改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产能过剩。为此,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投资消费失衡因素。

第一,出台一些能够真正改变现行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状况的政策措施,如调整个人所得税,针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物业税、遗产税等。加大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仅要考虑惠及最低收入阶层,还应将政策惠及面扩展到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并逐步提高保障标准。要降低居民支出预期,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最终带动整个投资消费结构向有利于消费的方向调整。

第二,立足于金融危机下外需萎缩的大背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and 整个宏观需求结构调整,降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对于以前依靠低劳动成本生存、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应当由市场机制来完成对它们的淘汰和退出,政府应重点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有较大内需规模,能实现进口替代的产品和企业。

第三,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配合县域经济发展,走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我们应加快推进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完善地县级行政区划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注重通过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带动居民生活方式改变和消费结构升级。应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居民收入,通过城市化推进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形成增加投资与启动消费良性互动的格局。为此,需要对房地产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加大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支持力度,降低农村居民实现城镇化的门槛。

#### 参考文献

- [1] 罗云毅. 投资消费比例关系理论研究回顾 [J]. 宏观经济研究, 1999, (12).
- [2] 余永定, 张宇燕, 郑秉文.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 [3] David 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M]. McGraw-Hill, 2001.

- [4] 梁小民. 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1993.
- [5] 董辅初. 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J]. 经济研究, 1959, (11).
- [6] 杨坚白. 试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和消费、积累比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 [J]. 经济研究, 1961, (10).
- [7] 杨坚白. 试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和消费、积累比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下) [J]. 经济研究, 1962, (10).
- [8] 韩文秀. 投资率在经济分析和决策中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J]. 中国工业经济, 1995, (10).
- [9] 张汉亚. 投资扩张向通货膨胀的转化机制 [J]. 中国投资与建设, 1995, (11).
- [10] 孙炎林. 合理投资率的实证分析 [J]. 统计研究, 2000, (8).
- [11] 吴忠群. 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和投资的确定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3).
- [12] 马秀岩. 投资、通胀与经济增长 [J]. 财经问题研究, 1997, (2).
- [13] 李建伟. 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演变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J]. 经济学动态, 2003, (3).
- [14] 卢中原. 关于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的探讨 [J]. 财贸经济, 2003, (4).
- [15] 罗斯托. 经济增长的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6] 钱纳里, 赛尔昆·埃尔蒙顿. 发展的形式 1950—1970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 [17] 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 速度、结构与扩展 [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 [18] Cheng, Hsiao. Analysis of Panel Data (Second Edi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责任编辑: 杨万东)

##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VESTMENT-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DESIRABLE INVESTMENT-CONSUMPTION INTERVAL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ross-Country Data

CAI Yue-zhou<sup>1</sup>, WANG Yu-xia<sup>2</sup>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732, 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100081, China)

**Abstract :** Factors of investment-consumption structure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with the desirable investment-consumption structure for China evaluated as well.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se factors, with panel data analysis and co-integration analysis using Chinese data as verification. It comes out that: (1)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urbanization level,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region and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conomic regime a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2) Taking all these into account, the desirable intervals for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ratio should be 40 ~ 45 % and 55 ~ 60 % respectively; (3) China's investment-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still in distor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stimulus actions should put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Key words :** investment ratio; consumption ratio; desirable interval